

『大和魂』史的

初步研究（下卷）胡槿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大和魂』史的

初步研究（下卷）
胡積著



本著的出版得到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审批委员会（项目名称：《日本精神的实像和虚像：“大和魂”的建构与变异》，批准号：12YJA752012）、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基金审批委员会（项目名称：《基于中日文化交流视域的日本文化实质研究》，批准号：2011b264）和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

目 录

下 卷

第八章 江户时代后期(1830—1867)部分著名儒者

笔下的“大和魂”	(619)
第一节 赖山阳吟唱的“大和魂”歌	(619)
一 “大和魂今样歌”的作者	(619)
二 赖山阳一家及山阳的《日本外史》和《日本政记》	(621)
三 《日本乐府》	(630)
四 对山阳及其后代的评价	(637)
第二节 吉田松阴的“大和魂”歌等	(641)
一 “大和魂”频出的天保至幕末年间	(641)
二 吉田松阴的“大和魂”及他的出生与学养	(647)
三 “明知有虎偏山行,欲罢不能大和魂”	(651)
四 “吾尸纵曝武藏野,白骨犹歌大和魂”	(657)
五 松阴的《留魂录》	(662)
第三节 本章小结	(665)

第九章 从“和魂汉洋才”到“和魂洋才”——日本对“和魂”与 “外(汉洋)才”关系的第三次理论思考

——从幕末到明治时代(1830—1912)	(668)
第一节 佐久间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	(669)
一 “和魂汉洋才”的前身	(669)

二	“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	(672)
三	“东洋道德”的实质是“以我为主,会通东西”	(674)
第二节	桥本左内的“机器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	(677)
一	桥本左内	(677)
二	松平庆永	(678)
三	桥本左内的儒、“兰”并用	(679)
四	生死皆为“仁义忠孝”	(682)
第三节	横井小楠的“明尧舜之道,尽西洋器械之术”	(684)
一	固守东方道德,实现与西方的双向交流	(684)
二	小楠的政治理想:仁=道德=君主的内心修养	(688)
第四节	阪谷朗庐的《意见书》:“日本学”、“汉学”和“洋学” 的关系	(692)
一	阪谷朗庐此人	(692)
二	《意见书》和《白鹿洞规》	(693)
三	“理”(儒)先“气”(洋)后与和汉不分	(694)
第五节	井上淑荫《学范》中的“和魂”(“皇朝学”)、汉学和 西学	(696)
一	“和魂”为主,汉学、西学为次	(696)
二	《国学辨》中“三学”的“并立并行”	(698)
第六节	旧神户藩藩校“教伦堂”《学则》中的“和魂汉 洋才”	(699)
一	首次使用的“和魂汉洋才”成语	(699)
二	“苟用于国家”可“不分彼我”	(700)
第七节	旧高知藩藩校“致道馆”《教场规则大意》中的 “和魂汉洋才”	(701)
一	高知藩及其第15任藩主山内丰信	(701)
二	“和魂汉才之全学”	(703)
第八节	《评论新闻》中的“日本魂”与“和魂汉才,兼备 洋学”	(705)
一	《评论新闻》	(705)
二	“和魂汉才,兼备洋学”的木户孝允	(707)

第九节 金子坚太郎“日本之国体与教育之基础”中的

“倭魂汉才”和“汉洋才” (713)

一 金子坚太郎的少年时期 (713)

二 进入哈佛学法律 (716)

三 回国后不久被伊藤博文看中 (718)

四 日俄战争期间赴美打宣传战和舆论战 (720)

五 与伊藤博文等一道制定《明治宪法》 (724)

六 金子坚太郎的“和魂汉洋才”与他后来的变异 (732)

第十节 本章及此前部分相关章节的小结 (736)

第十章 明治时代(1868—1912)海老名弹正的“大日本魂”和

吉野作造的“国家魂”,以及幸德秋水和木下尚江对

它们的批判 (746)

第一节 海老名弹正的“大日本魂” (746)

一 海老名弹正及其《思考日本魂之新意义》 (746)

二 今人和时人对海老名的批判 (752)

三 海老名的“大日本魂”与日本当时“大国殖民主义”
思想等的关系 (754)

第二节 幸德秋水对海老名弹正“大日本魂”的批判 (758)

一 幸德秋水的调侃式批判 (758)

二 态度摇摆的幸德秋水 (760)

第三节 吉野作造的《何谓“国家魂”?》 (763)

一 《何谓“国家魂”?》要说的是什么? (763)

二 吉野作造其人及其政治主张 (766)

三 吉野作造与中国 (773)

第四节 木下尚江对《思考日本魂之新意义》和《何谓

“国家魂”?》的批判 (777)

一 反近代天皇制国家和国家主义的勇士 (777)

二 木下尚江对海老名弹正和吉野作造的批判 (781)

三 木下尚江对“大日本魂”和“国家魂”的批判未画上
圆满的句号 (782)

第五节 本章小结	(786)
第十一章 “大正(1912—1926)民主运动”时期富于个人色彩的 “大和魂”的种种表现及原因	(791)
第一节 对“大正”年号意思的不同解释	(791)
第二节 “大正民主运动”的诸过程及其显示的意义	(794)
第三节 此阶段的各种“大和魂”	(798)
一 被调侃、挖苦、讽刺的“大和魂”——以夏目漱石、 内田鲁庵、冈本绮堂为代表	(798)
二 被批判的“大和魂”——以泉镜花、宫本百合子、 户坂润、堺利彦、岸田国士为代表	(812)
三 形象不清的“大和魂”——以梦野久作、森鸥外、 新渡户稻造为代表	(843)
四 带自由主义色彩的“大和魂”——以正冈子规、 小出楯重、长谷川时雨、中里介山为代表	(878)
第四节 本章小结	(892)
第十二章 甲午战争(1894—1895)至二战时期(1931—1945) 超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和魂”	(894)
第一节 日本的“进取心”和“大和魂”	(894)
第二节 “大和魂”与五个关键词——“尊皇”、“正义”、 “战争”、“勇气”和“赴死”	(898)
一 诗歌	(899)
二 大正、昭和时代的部分小说	(933)
三 戏剧	(947)
四 军事著作	(950)
五 报刊和杂记中的“大和魂”	(958)
第三节 本章小结	(959)
第十三章 “大和魂”是否科学并符合“现代精神”? ——昭和时代日本两位科学家对此问题的追问	(963)
第一节 永井隆《长崎之钟》中的“大和魂”	(963)

第二节 寺田寅彦《天灾和国防》中的“大和魂”	(971)
第三节 本章小结	(980)
第十四章 一半是“商品代言人”,一半是“政治宣传员”	
——二战后的“大和魂”	(982)
第一节 商品名称或商业、体育活动噱头	(983)
第二节 新“日本文化论”	(995)
一 上田正昭的“大和魂”	(995)
二 田中英道的“大和心”	(997)
第三节 本章小结	(1004)
第十五章 为重振日本民族信心开出的“药方”	
——“大和魂”在 21 世纪的其他表现	(1006)
第一节 小田全宏的“大和魂”	(1006)
第二节 伊井春树的“大和魂”	(1012)
第三节 神谷宗币的“大和魂”	(1020)
第四节 与国秀行的“大和魂”	(1025)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035)
总结语代跋	(1039)
附录 日本宗教包容性原理的成因初探	(1064)
主要参考文献	(1076)

下 卷

第八章 江户时代后期(1830—1867)部分著名儒者笔下的“大和魂”

第一节 赖山阳吟唱的“大和魂”歌

一 “大和魂今样歌”的作者

赖山阳(1781—1832)，出生于大阪，后随父移居广岛，其生存与活跃的年代与平田笃胤(1776—1843)相仿，但身份却是江户时代后期的儒者、汉诗人、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名襄，字子成或山阳，号“三十六峰外史”。此号来自他所著的《日本外史》一书，据说该书对幕末的尊皇攘夷运动影响颇大。

与笃胤热衷于“大和魂”不同，山阳基本不谈此“魂”，显示出他作为历史学家的理性一面，但他也在某首“今样歌”^①中吟咏过一次“大和魂”：

花明照吉野，春晓望四方。汉人高丽人，心追大和魂。^②

和前人所咏的各“魂歌”相似，此歌歌意亦不好懂。不过据河野省三说，弥富破摩雄^③在他编著的《大和心》中，有言此歌并非山阳所

① 平安时代中期到镰仓时代初期流行的新形式和歌，一般由4句7字加5字的句子组成。

② 转引自佐藤太平《樱花与日本民族》，太空社1937年版，第11页。原歌是“花より明くる三芳野の春の曙見渡せば唐土人も高麗人も大和心になりぬべし”。

③ 弥富破摩雄(1878—1948)，“国学”及和歌研究者，毕业于国学院大学研究科和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今东京大学），自1882年（明治四十五）至1915年（大正四）任昭和天皇皇太子侍从和教师。1926年任弘前高等学校教授。

作，而由福岡藩藩士大隈言道（1798—1868）的师父、儒者二川相近（1767—1836）所咏。^①就此著者进行查寻，发现该《大和心》的作者并非弥富破摩雄，而是中岛广足，刊发的时间是1819年，现收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其封皮书名为《山迹古古吕》（万叶假名，意为“大和心”）。中岛广足（1792—1864）此人不知何故不太为世人所知。他属熊本藩藩士，少年时曾是藩主侍童，24岁开始专心学习写作，是当时较著名的歌学家和“国学家”之一，写出130余部著作，所论涉及国语学、歌文、考证、注释等，尤精于国语学研究和歌文。再查弥富破摩雄对上述“今样歌”的叙述，所论虽不无道理，但结合其所说的该“今样歌”作者二川相近的思想倾向来看，后者是否会写出此般和歌令人生疑。二川相近是福岡藩藩士、藩“书学师”（书法教师）、儒者兼歌人，年轻时曾刻苦学习阳明学和晋唐名家法帖，开创出所谓的“二川流”书法，声名远扬，虽也学习过日本“国学”，但对汉学比“国学”更有好感，这从他喜爱并录写的众多中国诗句中都可以看出，比如他摘录的

文与可有诗见寄次韵答之东坡

为爱鹅溪白垩光，扫残鸡距紫豪芒。世间郡有千寻竹，月落空庭影许长。

因此著者猜测，能写出“花明照吉野，春晓望四方。汉人高丽人，心追大和魂”这样带有本国至上情绪、贬斥他民族的歌句的人，不太可能会是二川相近，而很可能是赖山阳（详见后文）。日本现当代学者佐藤太平等人也视此“大和魂今样歌”为赖山阳所作，恐出自相同的道理。当然我们这么说需要提供根据。下面拟结合赖山阳写的两部史书《日本外史》、《日本政记》，特别是他的汉诗集《日本乐府》，对该“今样歌”作出观照。为此需先简述赖山阳的生平，以及他所写的两部史学作品——《日本外史》和《日本政记》。

^① 河野省三：《大和心——大国隆正的思想》，光文社1942年版，第4—5页。

二 赖山阳一家及山阳的《日本外史》和《日本政记》

山阳父亲赖春水(1746—1816),朱子学者,在艺(广岛)藩“学问所”创设时被录用为“教授”,之后不仅为该校制定学制,而且还将学风统一到程朱理学的轨道上来,为后来“宽政异学禁”令的推行打下较好的思想基础。此外春水还善诗文,喜读史书,对水户藩德川光圀所编的《大日本史》景仰不已。但在同时,他又认为《大日本史》属纪传体史书,体例不好,因此产生了自己编修一部编年体史书的念头,且在一段时间内付诸实践。该书名为《监古录》,有仿照中国“以史为鉴”的意味。在编修之初春水意气风发,希望《监古录》能“发国家之御光,成不朽之盛事”^①,但后来由于他“官事繁多”,这项修史事业最终没能完成,如今仅存一百来行文字。

该“史书”文字虽少,但几乎全部涉及古代天皇,其中以“神武天皇”的记述为最多,显示出一定的尊皇倾向。春水在“神武天皇即位元年”条下,附有“三器论”、“祭政一致说”、“始祖附会吴泰伯辨”等标题,其具体内容因未写出而不详,但从标题推测,其尊皇情绪和强调日本有别于中国的思想较明显。不过和《大日本史》一样,《监古录》也用汉文撰写,反映出春水的儒学思想倾向。这或许是因为江户时代汉学风头很甚,读书人大都使用汉文,对他们而言,使用假名即为无文化的表现。甚至春水的祖上还把自己的日本姓氏改为单姓,也有效仿中国文化的意思。其实有此做法的不仅赖姓一家,当时许多著名人物也是如此。比如荻生(物部)徂徕在著文后多署名“物茂卿”;诗人菅波茶山简称“菅茶山”;宽政时期“三博士”之一的柴野栗山亦简称“柴栗山”;甚至连“老中”新井白石也曾署过“新白石”的姓名。当时日本崇汉却又希望有别于汉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春水在草稿中还多引用《大日本史》的说法,比如在不多的文字中,却有诸如“赞藪曰”、“彰考史臣云”等引语。想来在当时缺乏资料仅凭一己之力修史的情况下,春水有大量引用其内容的打算。《大日本史》的优点很

^① 《广岛县史》近世资料编 VI,“思想与教育”,广岛县志编辑委员会 1963 年版,第 79 页。

多,其中之一就是引用了海量的文献,此不赘述,但其中的一个思想特色,就是它打破长期以来的“常识”,视南朝天皇为“正统”。综合上述可以说,春水和当时许多儒者一样,思想都比较混乱。他一面推行朱子学,服务于幕府;一面又强调尊皇和“正统”,心系南朝,或反映出当时的政局混沌和时代风潮。不过认真想想,这种思想与宋学的“大义名分”和“正统”观念也颇为契合,所以春水和德川光圀以及《大日本史》的编者一样,看似思想矛盾而实质并不矛盾。这种思想的“混乱”对后来的山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山阳的母亲也是文人,雅号梅颺(颺即凉风,词组意为含有梅香的春风),江户时代后期的汉诗人、画家和歌人,大阪儒医饭冈义斋的次女,名静(日文名叫静子)。山阳幼年随母住在外祖父家,春水去江户后他很少见到父亲,所以山阳的启蒙教育来自母家,外祖父义斋为此也出力不少。比如他为外孙做的第一件衣服颜色是黄加黑,寓意《千字文》首句的“天地玄黄”,待山阳长大后,还从大阪购回《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供外孙阅读,其儒学世家的烙印于此可见一斑。

与此相对,来自父家的儒学教育也一点不差。如前述,春水素来敬仰朱子,曾倡言“本天道,主人伦,本末皆备,传之无弊,惟程朱为然,……程朱之学,乃古圣贤之学”。同时还在广岛藩校力排异说:“其或陷于卑近,或鹜高远,皆害其政(正)者,是之谓异学,不可不斥。”^① 山阳的叔父杏坪也曾吟诗:“已是渊源谬思孟,奚为传教违程朱?”^② 祖父享翁更不例外,在孙子回大阪时还把唐崎常陆介^③在某巨石上刻的“忠孝”二字拓下,送给山阳以作激励。由此可以想见山阳身受的教育和他后来为何会具有“忠君”的情怀。山阳13岁时曾作诗寄

① 转引自网络论文——春水斋《烟霞到处总君恩——赖山阳传》。此文由某中国人从日本某传记性论文移译而来,春水斋为何人不详,似为译者笔名,又或为某日人笔名。但所引资料似皆有本,可以采信。以下仅注作者名和书名,不标页码。2014年3月8日, www.poemlife.com/thread-537638-1...html。

② 春水斋:《烟霞到处总君恩——赖山阳传》。

③ 唐崎常陆介(1737—1796),江户时代中期的“国学者”和尊攘活动家,其家庭世代皆任广岛县矶宫八幡宫祠官。曾跟从谷川士清学习国学,在宝历事件中受牵连。与高山彦九郎交情甚好,在彦九郎自杀3年后也自刃,仅活60岁。

给在江户的父亲：

述怀（癸丑岁偶作）

十有三春秋，逝者已如水。天地无始终，人生有生死。安得类古人，千载列青史。^①

此诗中的“古人”无疑指具有“忠君”思想和民族大义的中国修史人士。昌平黉“教授”柴野栗山读后告春水：“此子甚奇，恐其为诗人耳，当使读史；读史则当自《通鉴纲目》始。”^②于是春水让山阳研读《通鉴纲目》。《通鉴纲目》即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其中的“正统”思想和民族大义，对之后的山阳影响至深。据说某日家中晒书，山阳无意阅读到苏东坡的《史论》大喜，叫道：“哇哟，天地间竟有如此文章！”并抄于一纸挂在壁上每日诵读。山阳在读中国史书的同时，还喜读日本的《绘本保元平治物语》和《义贞记》等“军事传奇”类史书，读后常堆土垒石作城砦，模仿书中人物语气说：“吾乃（织田）信长。今川义元前来！”后来山阳也立志修史，说要“继承父亲遗志，成就此（修史）伟业，使艺州书籍与人物驻留于日本所需之大典”^③。这与他接受父母双方家庭的影响和阅读的书籍都有关系。

山阳18岁时曾游学江户一年，返乡后在21岁时脱藩出走，被叔父杏坪在京都发现带回。作为藩士嫡子，犯“脱藩罪”按规定必须问斩，但经家人求情，山阳以癫痫病发作为由，仅被处废除嫡位和幽闭于自家。在幽闭期间，山阳还获藩准可以读书，这给了他专心学习、思考和写作的机会。《日本外史》的构思和初稿都在这段时间完成。3年后幽闭结束，山阳接着修改，于28岁时大致完稿。30岁左右山阳应儒者菅茶山邀请任后者经营的“廉塾”“都讲”（教头），一年后为宣传自己前往京都，在开办私塾的同时继续修改《日本外史》，于其中补入“论赞”之语。随着山阳的文名日显，该史书逐渐为世人所知，甚至连退

① 春水斋：《烟霞到处总君恩——赖山阳传》。

② 同上。

③ 《广岛县史》近世资料编 VI，“思想与教育”，广岛县志编辑委员会1963年版，第217页。

隐后的松平定信^①也差人前来索书。对此山阳当然乐意，另抄了一部并附上献辞呈给定信。

《日本外史》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类似于文学作品，严格说来不是史书，一个是内容仅限于武家人物，从源、平二氏一直写到德川第三任将军。前一点或源于山阳曾耽读“军事传奇”作品，又或与山阳的诗人气质有关。《日本外史》的大半内容都以《源平盛衰记》、《太平记》、《信长记》等“军事传奇”为素材，山阳的工作只不过是将其翻译成汉文而已。因未有严密、细致的考证，所以从学术角度来看，史实中多有谬误。^②其优点是所用的汉文优美华丽，简洁明快，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可读性强；后一点令人思索和值得研究的地方较多，那就是它的单纯武家内容和人物安排。山阳为何不按编史常规，先记述天皇再介绍武家不得而知，他本人及过去的史家皆未有说明。我们猜想这可能与山阳当时的心境、条件和对历史的认识有关。比如，因为山阳被幽禁，时间和资料都很有限，故山阳只能将武家人物先写出来，而将更宏大的修史事业留待他日。再者，山阳生活于江户时代后期，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之一，但对德川幕府的所作所为似乎不很满意。受朱子学“大义名分”学说的影响，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法，对幕府有所警醒和推动——能调整和皇室的关系。换言之，这部书是写给武家看的。

据说山阳 18—19 岁时在江户的生活并不愉快，品行不端，言辞中更视江户为秽土，显露出对德川幕府的反感。三国幽眠^③回忆：“山阳在江户见江户城广大，城门巍峨精美，上野、芝之家庙（德川氏家庙即宽永寺和增上寺）皆鍍金错碧，恶其僭越，愤曰：‘江户乃秽土。江

① 松平定信（1758—1829），江户时代后期的“老中”，原陆奥（今青森县大部和岩手县一部）国白河藩藩主，田安宗武之子，号乐翁。据说因尽力于藩政，天明饥饉时该藩无饿死者。田沼意次下台后成为“老中”，主导宽政改革，著有《花月草纸》、《宇下人言》等。

② 川田甕江：《日本外史辩误》（未刊。其中详细指出赖山阳《日本外史》的错误。有关问题在大久保利谦《关于川田刚博士的外史辩误》，《大久保利谦历史著作集 7》，吉川弘文馆 1978 年版，第 247 页，以及之后“卷一”部分有所介绍。

③ 三国幽眠（1810—1896），名直准，字士绳，通称大学，别号鹰巢、碌碌山人，江户时代至明治时代的儒者。越前（今福井县）三国地区某豪商之子，与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曾是同学。后到京都担任鹰司家“侍讲”（儒官），与梁川星岩等“尊攘派”有交往。在“安政大狱”时受到革职处分，维新后任“教部省权大讲义”（副总教官），著有《孝经傍训》等。

都非洁士所可长置身之所也!’一日,慨然有去江户之志。”其父春水的日记里也有这时“久太郎郁症”的记录。^①幽眠的说法值得参考,但他未必洞察出山阳的心机。然而无论如何,这段生活都会影响到山阳后来脱藩的行动和撰写《日本外史》的态度。

另一方面,山阳在元服仪式举行的那年还写过史论《古今总议》,也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幕府身上,显示出对日本封建时代政治的关心:“上古明王(神武天皇)创治,经二十余世而大变乱。当其时也,制度简易,天下皆兵,而天子自任将军。……藤原氏败落,武门及武士始兴,最初是平家,次之有源氏握兵马之权,一变大势。其后,北条氏窃夺权柄,失去民心,朝廷一时收揽大权。再有足利氏横出,大势更变。直至战国之世,织田信长取代足利,平定群雄,续而丰臣秀吉统一天下,完成封建之象。故大势共有三变。”^②以此比照30年后的《日本外史》绪论和内容,其关心的对象和基础思想少有改变。

此外,《日本外史》也可能是针对新井白石的《读史余论》(1712)而写。从前者的结构看,该书由正文和附于各卷前后、冠以“外史氏曰”一语的“论赞”(评论)两部分组成,格式为记传体,目的是仿照中国史书,使其为执政者的道德镜鉴,宣传“正者”子孙繁荣,“邪者”走向灭亡的果报思想。在此观念上,《日本外史》与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德川光圀的《大日本史》及新井白石的《读史余论》相同。而且“外史氏”的“论赞”也多模仿《读史余论》的“谨按”。再者,山阳在《古今总议》中对武家政局的变化使用“三变”的说法,也来自《读史余论》对日本历史的变化所用的“×变”的说法,其仿效新井白石的用意比较明显。然而在判断正邪的价值标准上,《日本外史》和《读史余论》有很大的不同,后者要求执政者要“仁政安民”,而前者认为“勤王”或“尊皇”是武士的最高道德义务,此观念的推演,必然会导致否定中国的“易姓革命”思想。这些差异在评价北条义时和北条泰时两父子等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足利氏正记”末尾“论赞”处,山阳提到“或曰”(新井白石)

① 春水斋:《烟霞到处总君恩——赖山阳传》。

② 同上。